



两种权力博弈中的三种“生态”

——贾平凹乡土小说的人类学解读

彭兆荣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的乡土社会存在着两种权力——“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的平衡与冲突，两种权力的博弈又集中地反映在三种“生态”，即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及人文生态之中。贾平凹在他的乡土文学系列诸如《秦腔》《古炉》《高兴》中生动地描述了两种权力与三种“生态”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横暴权力/同意权力 贾平凹 乡土文学

引言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了两种权力：一种是国家的、官方的权力，叫“横暴权力”；另一种产生于乡土、自治的权力，叫“同意权力”。^①在漫长的历史中，我国传统的乡土社会是自治的，主要实行“同意权力”，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符合地方特点、乡土本色的乡规民约。简言之，“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②，——既照顾到了传统的乡土秩序，又符合特殊和特定的“乡情”；同时以“家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的“礼制”为背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乡土本色”^③。

我国当代的乡土权力结构——自从国家权力下放到村落，村“两委”（即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代表着“国家权力”，必然与传统村落的“乡土权力”发生平衡、协调甚至冲突。两种权力的博弈也成为“新乡情”的一种结构性矛盾。贾平凹在乡土小说系列中生动地描述了这两种权力在新语境中的博弈与平衡，真实地呈现在三种生态：政治生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我国正在实行“乡村振兴战略”，笔者认为，正确处理好两种权力和三种生态的关系，是决定这一战略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依据。

一 政治生态中的权力

故事先从棣花村的“年终风波”说起：

年终时节，乡镇领导组织召开了“关于全乡本年度税费收缴的工作会议”，两委会的全体成员全部参加。组织者讲了税费收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调了清风街的债务数额很大，已经严

①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60页。

② 同上，第49页。

③ 同上，第6页。





重地影响着正常工作。这些债务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前任村干部借钱贷款开发七里沟,修村级碎石子路,不但贷款未还清,而且贷款的利息逐年积攒。二是由于村收入入不敷出造成的,大致包含国家税金、“三提五统”和各项摊派三大块。三是村民欠缴“提留”形成的恶性循环。会议决定此次催缴工作难度大,“一定要来硬的”……从县纪委调来的张学文年轻气盛,他讲了无论如何也要完成上级分解下来的征缴任务。会议上有人为此想出了口号:“坚持常年收,组织专班收,联系责任收,依靠法律收。”

治安员说:“依我看,今年工作难整哩!天旱,麦季减产,秋里虽说可以,但现在的物价上涨,村民手里哪有多少钱?”张学文说:“村干部不要先泄气!”治安员说:“我这不是泄气,我说的是实情。”张学文说:“就是实情,这话也不能说!”治安员说:“那我不说了。”低了头。吃他的旱烟。……

征缴了七天,只收到了全部税费的五分之一,而且那些交过了税费的发现大多数人家都没有缴,又来要求退钱。……

张学文带了李元田、吴三呈,又叫了派出所的两个警察,就先到了东街,铐走了瞎瞎和武林,到乡政府,把铁门关上……乡亲们汇集到了乡政府,铁锹、木棍、石头、砖块都往铁门上砸,铁门就哐哐啷响。数百人把乡政府围了。^①

“年终风波”实为两种权力斗争的缩影,而“横暴”的具象符号是“手铐”。“法治”终究需由人去实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手铐“铐”的是人的身体,却难以“铐”住传统的文化。即便是乡下人离开了自己的家乡进了城,他们带着的仍然是泥土的文化。《高兴》讲述了农民“离土”后的情形,小说的开篇就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这是 2000 年 10 月 13 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那原因只是五富死了,按照家乡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是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由此争吵起来,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警察又发现了绳子捆成的被褥里裹着“猪肉”,石热闹见状便跑,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旗杆上……^②

以刘高兴(我)为代表的农民,为了生存离开老家,到城里以拾破烂为生^③,已属悲凉;农民五富死在城市里,不能落叶归根,刘高兴用被褥裹尸,为死者“引魂回家”,已属悲催;而因买白公鸡与小贩发生争执竟被警察铐在了广场,则更是悲剧。

“横暴权力”以“专政”为后盾,具有强制性和不可争议性;“同意权力”在面对它的时候总体上无力抗衡。其实,在现实中,对于诸如“专政机关”与“治理机构”的关系,农民是很难在短时间里搞懂的。只要有“穿制服的”“带手铐的”,甚至连“戴袖筒的”(城市管理部门,《高兴》中称“市容”)都躲。偶尔也会发生“乡土智慧”以弱胜强的案例,但多少有些“阿 Q 精神”。贾平凹乡土文学系列中常有这样的例子;《高兴》讲

① 贾平凹:《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46-459 页。笔者转引时有压缩。

② 贾平凹:《高兴》,北京:作家出版社,2007 年,第 3 页。

③ 笔者在棣花村刘高兴家里与主人交谈的时候,发现在他的院落里堆积了不少各类空的瓶罐,显然是“拾”来的。刘高兴已小有名气,还保持拾破烂的习惯。



了一个故事：

那天我的喉咙发炎老咳嗽，就在邮局门口前的广场上咳嗽的时候，一个人在不停地看着我，我心里还说，咳嗽有啥看的，你没咳过？等一口痰咳出来，他就走了过来，说你咳嗽了，我说喉咙发炎，他说你得去看医生，就给我一个纸条，我说谢你呀。他说你看看条子。我一看才知道是五元的罚款收据。我说你是干啥的？他从口袋里掏，掏出个黄袖筒套在左胳膊上。我没急，也没躁，我说，袖筒应该戴在胳膊上，你为什么装在口袋？你们的责任是提醒监督市民注意环境卫生，还是为了罚款而故意引诱市民受罚？他不自然地给我嘿嘿。我说，你的态度严肃些！你是哪个支队的，你们的队长是谁？他说：“你是……？”我说，群众反映强烈，我还不信，果然我试着吐一口痰你就把袖筒掏出来了！他一下就慌了，给我赔礼道歉，并保证以后袖筒一定要戴好。我抬脚就走，他说，你走好，领导！他叫我领导，这让我来了兴趣，我回头说，你怎么知道我是领导？他说：你过来的时候迈着八字步，我就估摸你是领导，可见你的肚子不大，又疑惑你不是领导，怪我有眼无珠，竟真的是领导。哈，我竟然做了一回领导！从这件事后，我也就再不纠正我的八字步了，但我的肚子却如何每顿饭多吃半碗仍没有大起来。^①

对于“横暴权力”的批评，作家总是谨慎的，因为有风险。他坦白：“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②于是，“变着法子说”可以起到特别的效果。贾平凹的《古炉》，以“文革”为背景，曲折地讲述了“村支书”所代表的“横暴权力”到达极致的景象：

狗尿苔看了一会，听见不远处有鸡在很凶地呵斥：这是谁的蛋？！就见从土埂的斜坡上走来了支书家的那只公鸡，它满脸赤红，八字步，两个翅膀拖在身后，怒不可遏。狗尿苔觉得奇怪，就走到土埂沿往下一瞧，这里是上百年前老窑场倒瓷片垃圾的地方。原本垃圾堆积得也成了土埂的一角，经长年雨水冲刷，土埂角又跨了，截面上露出碎瓷片，全泛着亮光，而埂底的草窝里竟真的有一颗蛋。这一定是谁家的母鸡下野蛋下到那儿去的，而支书家的公鸡也一定是发现这并不是它踏过的蛋在发脾气了。^③

这一“比兴式”的文学描写，生动淋漓。一个从远古、自治性的传统村落，在“文革”期间，“支书”的权力惠及到了“他家的公鸡”，而古村落的文化成了“瓷器的碎片”的隐喻。“支书—公鸡”成了横暴权力底下的“阴影”。作家说：“《古炉》写了‘文革’间人变坏的过程，也写了善的恒常不变。”^④以他母亲为原型的老妇“蚕婆”就是善的典型。

二 自然生态中的“道路”

其实，“自然”是“人化”的，我国尤是。以“道”为例，它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自然”表达。“道”的基本语义是依据自然的形态修建的通道；本义就是道路，“道”是“导”（尊）的本字。《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⑤

① 贾平凹：《高兴》，第71页。

②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546页。

③ 贾平凹：《古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72-73页。

④ 参见孙见喜、孙立盎《贾平凹传》，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9页。

⑤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4页。

道家取之本义而引申,“道”代表自然律。这样,“自然—规律”(“道法自然”)成为我国“道”之最具代表性的意义表述。在乡土社会,“道”在两个层面上都有贯彻,并形成了乡土特色。

棣花古镇原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故有“棣花驿”之称。商於古道为古代的军事、政治、商贾之道,其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古道由陕西省商洛市(古时亦称上洛郡、上洛侯国、洛州、商州)通往河南省内乡县柴关镇,全长约六百里。秦汉时称作“武关道”,唐时又称为“商山道”或“商州道”。商於古道原是在自然形态中修建的一条路,其筑路的原则:以自然形势和形态为根据。

修筑道路历来都有促进地区繁荣,促进人员、民族、文化、物资等的交通与交流的功能。但是,“道路”的开通所包含的一般“道理”并非总与现实功效相吻合,也存在矛盾与悖论,特别在现今修建道路的具体实施中,诸如以何种方式,以什么规模,在什么地点开建道路,经常成了一种“权力的霸道”,尤其是国道。

交通对于传统闭塞的农村而言是“有幸的”,但也是“隐忧的”。贾平凹在他的散文《从棣花到西安》一文中,真切地描述了修建公路、铁路对于家乡变革的感受:

秦岭的南边是棣花,秦岭的北边是西安,路在秦岭上约三百里。世上的大虫是虎,长虫是蛇,人实在是个走虫。几十年里,我在棣花和西安生活着,也写作着,这条路就反复往返。

父亲告诉我,他十多岁去西安求学,是步行的,得走七天……到我去西安上学的时候,有了公路,一个县可以每天通一趟班车,买票却十分难,要头一天从棣花赶到县城,成夜在车站排队买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条公路改造了,不再是沙土路,铺上了柏油,而且很宽,车和车相会没再减速停下,灯眨一下眼便过去了……过了 2000 年,开始修铁路。棣花人听说过火车,没见过火车,通车那天,各家在通知着外村的亲戚都来,热闹得像过会……有了火车,我却没有坐火车回过棣花,因为火车开通不久,一条高速路就开始修。那可是八车道的路面呀,洁净得能晾了凉粉。村里人把这条路叫金路,传说着那一捆子一捆子人民币铺过来的,惊叹着国家咋有这么多钱啊!

……

在好长时间里,我老认为西安越来越大,像一张大嘴,吞吸着方圆几百里的财富和人才;而乡下,像我的老家棣花,却越来越小。但随着 312 公路改造后,铁路和高速路的相继修成,城与乡在接近了,它吸去了棣花的好多东西,又呼吐了好多东西给棣花……^①

作家在细细回味从家乡到省城的交通历史中夹杂着自豪和兴奋,迷惑和苦恼。几年前,当我们在公路上看到从车窗外掠过的宣传牌“要想富,先开路”的时候,我们总是欣喜着;然而,当一条条的“国道”通进了闭塞的传统村落时,内心又闪过一丝丝的苦意。这也正是作家的真实感受。

贾平凹在《秦腔》中喜欢在描述农村重要的变化和变革事件中夹着个乡土性的“真实隐喻”——这种隐喻既可以是真实发生的,也可以是人们相信其是真实的。312 国道的改造对棣花镇而言,是个最大的事件,贾平凹这样表述:

清风街上的清风寺后面有一棵大的白果树,白果树上住着一家鸟。大年前一只鹁子飞来打架,鹁子和鸟夫妻打得非常激烈,白的灰的羽毛落了一地。人们想帮鸟夫妻,但掷石子掷不到那

^① 贾平凹:《从棣花到西安》,《游戏人间》,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7 年,第 15-19 页。



么高。战争持续了三天三夜,鸟丈夫被啄瞎了眼睛,跌下来摔死了,紧接着鸟妻子也跌下来,先还能睁眼,不到一个时辰也死了。奇怪的鷓子并没有占巢,从此飞得没踪没影,直到连刮了七天黄风,鸟巢被刮了下来,才发现巢里还有两只雏鸟,差不多都干瘪了。

白果树上的鸟遭到灭绝,正是 312 国道改造的时候。312 国道原规划路段要避开清风街的后塬,从屹岬岭随着州河堤走,可以是堤又是路,不糟塌耕地。可后来是从后塬经过,这就把清风街的风水坏了。风水重要得很,就是风水一坏,夏天义下台了。^①

农民只有土地,也只会土地上扒吃喝,而清风街人多地少,不解决土地就没辙。这几年盖房用地多,312 国道又占了咱那么多地,如果办市场,不但解决不了土地问题,而再占去那几十亩……那几十亩可都是好地,天义叔他们曾经在那几十亩地上亩产过千斤,拿过全县的红旗的……君亭哼了一下,秦安就不说了……“农民为什么要外出,他们离乡背井,在外看人脸,替人干人家不干的活,常常又讨不来工钱,工伤事故还那么多,我听说有的出去还乞讨,还在卖淫,谁爱低声下气地乞讨,谁爱自己的老婆女儿去卖淫,他们缺钱啊!”君亭说得很激动……^②

“国道”的原则是“无可商议”,它是以“国家工程”的方式打通“自然”,在道路学研究中,国道可以说是“权力”的化身,是笔直的、钢硬的,“与天地奋斗”的榜样。相形之下,在乡土社会里,乡村小道以遵循自然形态、形势为原则,是灵动的、柔和的。^③虽然面对道路修进了村的事实,村民们保持着“守旧”心态:一方面他们深知,道路的变化客观地反映时代发展的需要,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另一方面,他们看到自己熟悉的环境的快速变化,特别是以国道为“体用”的乡村横行,他们也只能抱着守着传统期盼未来的忐忑心态。作家在他的乡土文学系列中,非常生动地描述了农民的这种矛盾心态。

自然生态有体有脉、有形有势,遵循的原则是有形有相、有风有水,这些都掺杂在了传统的风水形貌之中。重要的是,我国传统村落形制都遵循风水观——中国古代自成体系的自然生态观。然而,当“国道”遇到“乡道”时,权力的“霸道”完全无视村落的风水体系,清风街的东西向脉被拦腰斩断,村落的形制遭到破坏,摧毁了乡土风水。看一看果树上的鸟巢的命运就明白了。

贾平凹在《高兴》的“后记”中谈到回乡与刘高兴交流时有这样一段话:我(作家)“问起村里的事,他(刘高兴)说了。咱这里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公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两分地,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④刘高兴进城捡破烂,鲜活地反映了失地农民的窘迫情状。

三 人文生态中的“乡土”

在中国,自古以来,伟大的作品必需、必然要反映“天人合一”——“天文——地文——人文”的价值观;而要反映这一传统的价值观,乡土表述不可或缺;因为,本质上说,中华文明属于农耕文明,所以“乡土”也成了“人文生态”的最完整表述和最忠实的保留;《秦腔》中的乡土正是人文生态的客观体现。贾平

① 贾平凹:《秦腔》,第 23-24 页。

② 同上,第 87 页。

③ 参见彭兆荣《论乡土社会之道路景观》,《云南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④ 贾平凹:《高兴》“后记”,第 435 页。



凹曾经在回答《秦腔》中“神秘事物”的问题时说到:“这和我的生存环境有关。我生活的那个地方佛和道都特别盛行,巫文化也特别盛行,无形中受到这种东西的影响,《秦腔》中淡化了一些。”^①

“人文”是一种“染色剂”,一旦染上,就难以褪色,无法完全洗白,特别是在故乡长大成年后,地方人文就成了一种烙印,更无法改变,仿佛“乡音”。写乡土人文,就要熟悉之,而且多半本人浸淫其中。乡土的人文环境勿宁说是一个“文化的染缸”,染上了就难完全去色。“人文”的具象通常是地方性的;传统村落,包括村落的形制都是“人文”与“自然”的契合;“自然村”即是一个生动的表达。

贾平凹的家乡棣花镇,丹江自此流过,人称州河。丹江经商州、丹凤、商南入河南境,再过浙川老河口往湖北,到那里汇入汉水入长江。以前在水脉旺时,外来的船楫直到丹凤县城龙驹寨,当地的船民水手为了帮会联络,在龙驹寨还筑起了一座船帮会馆,人称花庙,至今尚存。^②自古以来,村落的形制皆由自然环境而来,自然是生存的第一原则,而“风”与“水”便成了村落建设根据“形势”构建的核心价值,我国传统的汉族村落建制几无例外。

棣花古镇整体上南北向制,南面是群山的高处,有一座山当地人称作“笔架山”,贾平凹的老宅、新屋皆面向南,门面朝南,门槛略歪,却正对“笔架山”,当地盛传,这样的形势要出“秀才文人”。当地民众更愿意在“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中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表述和阐释。对于作家的“成名”,他们必定是认定贾家面对“笔架山”的风水传奇。至于古镇的老街——“清风街”,更是传统风水的典范:东西走向,水路环绕,“靠——抱——罩”一体,完全符合中国传统风水的形制。这种自然与人文交融的生态也成了当地村落的基本脉络。

“人文”的地方性在民间的表述是所谓的“风俗”,就像秦腔属于秦地秦人一样。贾平凹在故乡长大成人,对自己家乡的情况不独是一个观察者、体验者,更是其中的一个份子,一个农民。他在《秦腔》“后记”中写道:

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得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苕吃坏了我的胃。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的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后,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③

当然,这要有心、有情,还要有义。有时离开后再重返,有“温故知新”的体验。比如家乡的山对于贾平凹来说就是这样:

在城里呆得久,身子疲倦,心也疲倦。回一次老家,什么也不去做,什么也不去想。懒懒散散地乐得清静几天。家里人都忙着他们的营生,我便往河上钓几尾鱼了,往田畦里拔几棵菜了,然后空着无事,就坐在窗前看起山来。

① 孙见喜、孙立盎:《贾平凹传》,第 297 页。

② 同上,第 2 页。

③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 540-541 页。



山于我是有缘的。但我十分遗憾,从小长在山里,竟为什么没有过多少留意?如今半辈子行将而去,才突然觉得山是这般活泼泼的新鲜。每天都看着,每天都会看出点内容;久而久之,好像面对着一本大书,读得十分地有滋有味了。

其实这山来得平常……再看看,果然看出动人之处,那阳面、阴面、一沟、一梁,缓缓陡陡,起起伏伏,似乎是一条偌大的虫,蠕蠕地从远方运动而来了,蓦然就在那里停下,骤然一个节奏的凝固。这个发现,使我大惊,才明白:混沌沌沌,原来是在表现着大智,强劲的骚动正寓以屑屑的静寂里啊!

……

到底我不能囫囵圉圉道出个山来,只觉得它是个谜,几分说得出,几分意会了则不可说,几分压根儿就说不出。天地自然之中,一定是有无穷的神秘,山的存在,就是给人类的一个窥视吗?我趴在窗口,虽然看不出个彻底,但却入味,往往就不知不觉从家里出来,走到山里去了。^①

“生态”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只是当今被广为使用,内涵和外延都在扩大。它原本即表示“人与自然”的认知关系,特别是地缘知识与民间智慧。在乡土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说,“生态”都是检验传统村落的关键词,——无论谁,通过什么方式去改造她,改变她,都与“生态”脱不了干系。之于山脉,之于河流,之于生境,皆如是。

结 语

贾平凹在评述《秦腔》时说:

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们是农业国家,供养我们一切,农民善良和勤劳。但是,长期以来,农村却是最落后地地方,农民是最贫困的人群。当国家实行起改革,社会发生转型,首先从农村开始,它的伟大功绩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虽然我们都知道像中国这样的变化没有前史可鉴,一切都充满生气,一切又都混乱着,人搅着事,事搅着人,只能扑扑腾腾往前拥着走,可农村在解决了农民吃饭问题后,国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城市,农村又怎么办呢?……

棣花村没有矿藏,没有工业,有限的土地在极度地发挥了它的潜力后,粮食产量不再提高,而化肥、农药、种子以及各种各样的税费迅速上涨,农村又成了一切社会压力的泻洪池。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哩哗啦地没了,像泼出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趑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地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根须上的土,栽到哪里都是难活。^②

这是中国农村的真实写照,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乡村振兴战略”,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国情。

附:为了解贾平凹乡土文学中所描写的原型故事,笔者专门前往他的家乡,走访了他的家人和当地

^① 贾平凹:《读山》,《自在独行》,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5-148页。

^② 贾平凹:《秦腔》“后记”,第542页。



民众,对贾平凹乡土文学中的一些案例进行现场调研,管窥传统村落之“权力/生态”之间的主要矛盾和大致形貌,以下是笔者对作家的胞弟贾栽凹的访谈。

棣花访谈记录(节选)

访谈人:彭兆荣(以下简称“彭”)

访谈对象:贾栽凹(贾平凹胞弟,1955 年出生,以下简称“贾”)

访谈地点:贾栽凹家

访谈时间:2018 年 8 月 2 日上午 9 点至 10 点 30 分

整理人:纪文静

彭:中国几千年来的官僚制度只到县一级,县以下的乡村都是自治的。村落的形成主要是从宗族延伸出来的,是一个大家,比如:贾村、张村、李村,就具有主人翁意识。这个村就是我们的家,这块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现在的村落主要由“两委”行使治理权力。

贾:在七八十年代以前,原来的村落治理、协调组织工作只需要五六人,现在却需要七八十人,两万人口的村落配备八十个行政人员。这个数量比八十年代一个县委、县政府的人都多。现在乡镇数量减少了,过去丹凤县有四十二个乡镇,现在变成了十二个,工作人员数量没有减少,而且年年还在招人。想做这份工作的人都想管理人,都不想劳动,都喜欢权力。

彭:我们这次也到北京通州区的里二泗村调研,那个村的机构设置也多样复杂。过去,村落都是老百姓自治的,都是一些乡贤、族长在管理村落事务,有什么问题集中开会讨论解决即可,哪里需要这么大的管理机构。

贾:过去县长哪里要 8 点上班,6 点下班。原来的干部,都是将明天的事情布置好,几点钟下乡,在哪里集中约一下,时间一到,开车就去了,留下几个值班的即可。

彭:现在很多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官当一两年就走了,他们也弄不懂村落。

贾:现在的官员只强调年轻化,也是一个问题。村干部 50 岁以上就不给干了,人 40 至 50 岁的时候才真正成熟,但是中国的官员到 45 岁的年龄就不会再有提拔的机会。

彭:主要是中国目前失业率高。在乡村,真正了解乡情,有智慧的人是那些乡贤、族长、寨老。

贾:农村的工作不比城市,往往需要年长者带领年轻人。年轻人没有社会经验和农村经验,是管理不好乡村的。原来乡村是族长制,很多族长年龄长,经验丰富,拥有生活智慧,而且公平,所以才德高望重。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族长制传承一塌糊涂,搞得都是二流子当村长,这些人把村落搞乱了。近二十年来,国家才慢慢意识到。

彭:顺便问一下贾先生,棣花村原来是商於古道上的驿站,不会像其他村落是单姓村,棣花村应该是有许多姓氏的家族,你们贾姓家族在本地势力大吗?

贾:是的。

彭:在本地贾姓家族中,像您这样有知识、有文化、有威望的人能不能在今天的村落事务中起到作用?

贾:现在在本地,有文化、道德修养高的人往往不当干部,没人当。当干部的人都想着挣钱或为自己谋私利。过去家族里也有当过干部的,近年来没有人当干部了。我们的家族都是按照辈分秩序管理,一般都不会出现打闹的现象。

彭:贾姓族人有可能到外地当官,他们在故乡的村落中有没有权威呢?有很多村落的乡贤尽管不是干部,但是他们经常能超越当地干部,能够解决家族内部的矛盾并管理事务,这种情况在当地还有吗?

贾:还有。

彭:乡贤和族长会解决家族事务吗?

贾:是的,家族内部有矛盾的,一般不会拿到外面解决,内部解决就行了。比如,这次族里一个侄儿被车撞了,撞人的人也是本家族的,就在家族内部解决了,没有出现高额赔偿。本来要赔一万七千多元,最后一万元解决了。

彭:这就是我们要考察的。如果一个村落的地方贤达、宗族力量仍然很强,那么这个村落就能保存得很好。如果失去了这些,完全是由外来人或上面派来的人管理,由他们说了算,这个村落的文化很快就会丢失。地方贤达、宗族的力量在本地还有吗?他们的力量强大吗?

贾:这里每个自然村还存在这些力量,特别是家族里面年长的,做事公平的,能说能劝,有威望,能够给年轻人讲道理的人还在管理家族事务中发挥作用。

彭:您哥哥出版的系列著作中,有没有专门讨论这种乡村地方力量解决村落内部问题的故事和情节?

贾:《古炉》里面有这样的情节和故事。

彭:我们国家现在搞“乡村振兴”也好,恢复传统文化也好,首先得看一下乡村的力量是否强大,如果乡土力量已经被摧毁了,那么这个村落将不被看好;如果村落中这个力量还很强大,村落的“草根性”很强,哪怕有一场运动把她上面的东西都灭掉了,但是“根”还在,一旦时机到来,便会萌发成长,这是我们考察的重点。

贾:原来管理村落的都是年长德高望重的人,现在50岁、55岁就让退休了。实际上,50—70岁年龄的人才是管理农村的最佳人选,这个年龄段的人是最成熟的,最有智慧和权威的,一是年龄长,二是经验丰富,三是能管好。现在很多农村人不买村干部的帐,农村人有倚老卖老的认知思维,现在村落都是让外面人来管理,过去都由族长管。德高望重、公平的人才能将村落管好。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7AA001)阶段性成果。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责任编辑:毛巧晖】